

# 餐桌上的戰爭—— 日治末期臺灣的食物配給、黑市 與殖民地社會

曾品滄\*

本文主要藉由日治末期臺灣總督府所實施的食物配給統制、本地民眾為了對抗配給而興起的黑市交易活動，以及疏開時日、臺人間的互助與食物分享，來觀察、分析戰爭期間殖民地社會的變化，說明臺灣人在戰爭中的處境及其對抗戰時總動員體制的能動性。目前大多數關於戰爭時期殖民地史的研究，皆將臺灣人置於總動員體制下的被動員者和皇民化運動中的被改造者角色進行討論。但從本文的分析可發現，作為食物或食料品生產者的臺灣人，在物資匱乏的戰爭時期，得以藉由無所不在的黑市活動，反抗殖民政府的差別化食物配給政策，進而對殖民統治者在講求戰爭一體化下，仍執意鞏固的階層化社會構成威脅。而戰爭末期配給物資的枯竭，以及為了躲避空襲而實施的疏開，更迫使日本人轉而珍視臺灣人的飲食傳統，在日常生活上尋求在地化，進而形塑了五十年來未曾有的「內臺一體」化殖民地社會。進言之，在戰爭動員體制中，臺灣人並非只是單純的被動員、被改造的對象，其憑藉著在地化優勢及其對食物資源的掌握，確具有改變皇民化運動與階層化殖民社會的實質影響力。

關鍵詞：戰時總動員體制、食物配給統制、黑市、皇民化運動、在地化

---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一、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被認為是人類總力戰的典型。所謂總力戰，不只是在前線的軍事組織從事戰鬥，在戰線後方的社會，無論是精神、人力、物資等也都被動員加入，形成全國一體之總動員體制的戰爭型態。也因此，總力戰帶來的混亂與破壞遠比以往的傳統戰役更劇烈，對人類社會的衝擊也更全面且徹底。然而，總力戰並非全然的破壞，它也帶來新生或改革的契機。許多原來受到差別待遇的群體，因為政府實施「強制的均質化」政策，藉以謀求戰爭參與的一體化，因而在戰中或戰後社會再編成的過程中，獲得平等對待的機會。<sup>1</sup>包括居於弱勢的婦女、勞動階層、農民等，皆因為在後方為戰爭付出巨大貢獻，而受到國家前所未有的重視。

在所有為戰爭而採行的動員措施中，總力戰所帶來的平等化、均質化作用，在食糧或其他飲食消費物資的配給制度上，更得到普遍且具體的實踐。受惠於近代營養學的發展與各種科學化的調查，在二次大戰前，許多國家或政府已可正確掌握維持國民身體健康之基本營養攝取量。戰爭爆發後，國家為了妥善運用各種物資，不僅管制物資的生產與流通，並根據此基本營養攝取量，實施配給制度，分配給每位國民必要的糧食或其他飲食必需品，每個人的營養攝取都受到國家均質、軍事化的支配。其結果，原來依照財富、身分、嗜好、飲食習慣或儀俗而形成的日常飲食內容，被轉換成依照年齡階層與勞動量進行分配，較高勞動量的勞工和農民，反而比原來較為富裕的城市中產階級獲得更高熱量的食物，改善其原本貧乏的營養攝取狀態。英國的例子即顯示，二次大戰時期的食物配給使營養不良的貧民獲得健康改善

---

<sup>1</sup> 石津朋之，〈總力戰と社会の変化〉，頁 59-95。

的機會，婦女的死亡率也因此降低，並且有效泯除不同收入社群間在日常飲食上的巨大差異——這個自 1930 年代以來即備受關注的社會問題。<sup>2</sup>

雖然食物配給政策的實施可能帶來若干益處，畢竟難以滿足民眾個別的食物需求與嗜好，尤其包括日本在內的大多數交戰國都未能如英國般有著充裕的主食物資，在物資日漸枯竭、調度困難，以致食物配給量日漸減少而無法達到基本營養攝取量之時，更易對全體民眾身體健康造成嚴重威脅。為了對抗國家對個人食物消費的過度支配、滿足自身營養與嗜好的需求，民眾只好求助於黑市(black market)。所謂的黑市也就是非法的交易活動，但在戰爭時期，它特別指的是買賣〈總動員法〉及相關配給統制法所禁止交易的物品，或是以這些法令規定之外的價格進行交易等活動。<sup>3</sup>

黑市雖是經濟統制政策的一大威脅，卻也因為是民眾在戰爭中反抗國家動員、滿足個人飲食習慣與嗜好、在食物短缺中確保自身健康的重要手段，即使政府嚴格取締，甚至像英國一樣施行被認為成功的配給制度，也仍然難以抑止黑市的普遍發生。<sup>4</sup>可以說，二次世界大戰不僅前線烽火連天，戰線後方也存在政府之食物配給統制政策與民間之黑市活動的激烈攻防。

黑市的盛行雖可能對食物配給政策帶來破壞，進而對總力戰所帶來的均質化作用造成影響，但它也有助於生產者，諸如相對市民階層而顯得弱勢的農民，以及為殖民母國生產糧食的被殖民者，在食物短缺的情況下因為掌握食物原料而重新確立其價值，進而有了翻轉經

<sup>2</sup> Ina Zweiniger-Bargielowska, "Fair Shares? The Limits of Food Policy in Britai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25-138.

<sup>3</sup> 綠柳生，〈時局新用語解說〉，頁 32。

<sup>4</sup> Ina Zweiniger-Bargielowska, "Fair Shares," 125-138.

濟、社會甚至文化地位的契機。換言之，無論是總動員體制的實施，或是配給政策所引發的黑市現象，皆有助於鄉村或是以農為主業之被殖民者強化對抗既有不平等社會結構的動能，重塑城市與鄉村或殖民與被殖民者間的關係。<sup>5</sup>

在這場戰爭中，臺灣雖非前線戰場，但作為主要交戰國——日本帝國下的殖民地，與母國和其他殖民地一樣，承受戰爭帶來的各種束縛與災難，其中也包括因為戰爭動員而實施的食物配給制度，無論是作為殖民統治者的在臺日人或是被統治者的臺灣人，其三餐生活都同樣受到該制度的約束。為了對抗經濟統制與配給制度，許多臺灣人也利用黑市進行各種飲食物或食料品交易，黑市活動的盛況不亞於同樣受戰爭之害而採取食物配給的國家與地區，成為當時人對於戰爭生活的鮮明記憶。如果食物配給與黑市皆有助於改善或衝撞既有不平等社會結構，日治末期的臺灣在實施這些非常態性的戰爭措施時，是否也對既有的殖民地社會結構，以及日、臺人之間的關係帶來影響？

長期以來，學界對於臺灣與臺灣人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及其處境，以及戰爭時期的各種生活經驗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在這些成果中，雖然少數著作也將視野擴及在中國的臺灣人所採取的抗日運動，呈現臺灣人在體制外反抗殖民統治的面向，但大多數研究議題，包括皇民化運動、臺灣人海外參戰、軍需工業發展與邊區開發，以及經濟統制等，仍將臺灣人置於動員體制下之被動角色加以論述，討論其被迫從事精神動員(如「皇民化」)、被徵召參戰、被徵收物資，經濟活動被

---

5 關於戰爭中黑市活動形塑城鄉關係的例子，可參閱 Edouard Lynch 對二次大戰時期法國黑市的研究，Edouard Lynch, "Food Stocks, the Black Market, and Town and Country Tensions in France during Two World Wars and Beyond," 229-244.

強迫統制等經驗，<sup>6</sup>乃至於戰爭結束後臺灣人被以「戰犯」論處，或以日本共犯(皇民)而遭受敵視的處境。<sup>7</sup>然而，上述視角也容易忽略臺灣人的能動性(agency)，即使戰爭帶來巨大的壓力，島內的臺灣人在適應各種動員之餘，並未完全喪失對抗體制之能力，尤其對於像是食物配給這類攸關生命的事項時，以農業為生計的臺灣人更容易展現其優勢，進而對於其被殖民者地位，以及臺日人間的不平等關係帶來影響。

本文主要目的即論述日治末期臺灣殖民地政府所實施物資配給統制，和臺灣民眾盛行之黑市活動所形成的食物爭奪戰，及其對既有之階層化殖民社會結構的影響，以深刻反映戰爭時期臺灣人的角色、處境。雖然戰時的物資統制是本文的主要論述背景，但因相關法令極其繁雜，且歷來已有李力庸、黃仁姿、郭怡棻等對於米穀的生產與配

<sup>6</sup> 關於戰爭時期臺灣的相關研究，歷來成果極其豐碩，為免掛一漏萬，本文在此不一一說明。以下僅就論及臺灣人在戰爭中之處境及其對應態度的研究作品進行說明。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主要闡述戰爭時期日本政府與總督府對於殖民地臺灣所建立的戰時體制的形成、特色，及其在終戰後的崩解。該書部分要旨，以吳新榮(1907-1967)為例，說明臺灣人在此非常時期，儘管處於皇民化運動風暴中，仍如雜草般試圖堅強存活下去；只有少數臺灣人選擇將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抗運動轉移至中國，以推動中國光復臺灣的姿態持續進行反抗。陳翠蓮的〈戰爭、世代與認同〉一文，藉由林獻堂(1881-1956)、吳新榮與葉盛吉(1923-1950)三人的日記，細膩刻劃戰爭時期的心境，及其臺灣人 / 日本人意識的轉變。作者認為雖然三人對皇民化運動與各種動員採取的態度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特徵是，「臺灣人在戰爭體制下艱苦謀求生存，並未因此就同化為日本人，反倒是對土地的摯愛情感被激發，護衛臺灣的意志在戰爭末期不斷強化」。惟這三人也僅處於精神意識上的轉變，並未進一步化為反抗體制的具體行動。簡言之，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多數傾向島內臺灣人在戰爭中只是作為一個被支配者的角色，對於戰爭體制並無具體的反抗行動，並展現實質的影響力。參見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陳翠蓮，〈戰爭、世代與認同〉，頁 223-279。

<sup>7</sup> 藍適齊，〈可悲傷性，「戰爭之框」與臺籍戰犯〉，頁 393-433。

給統制的相關政策內容、實施過程，及其相應的經濟警察制度進行完整研究，<sup>8</sup>為了避免陷入法令規章與配給制度無止境的瑣碎分析，本文將盡量減省這部分的討論，而是更多著墨在食物與食料品配給統制對當時人的制約，以及臺灣人與在臺日人對此制度的肆應方式，進而論述在糧食匱乏、彼此競爭食物資源的困境中，兩者對殖民地社會不平等關係的反思及其具體影響。

## 二、「內臺一體」的虛像——殖民地社會的食物配給

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為了因應不斷擴張的局勢，中、日雙方皆努力徵集、調配各種人力與物資投入戰場，以謀求最後的勝利。日本政府先是於1938年4月公布〈總動員法〉，並於該年5月開始逐步實施各種動員計畫。自此之後，包含日本本土與各殖民地在內，整個日本帝國開始進入「總動員體制」。該體制不僅在戰爭中影響民眾生活甚鉅，即使到了戰後，因戰爭的魅影未除，許多統制措施仍被沿用，其影響力依然持續發酵。<sup>9</sup>

---

<sup>8</sup> 李力庸，〈戰爭與糧食——太平洋戰爭前後臺灣的米穀統制(1939-1945)〉，頁103-137；李力庸，〈日本帝國殖民地的戰時糧食統制體制——臺灣與朝鮮的比較研究(1937-1945)〉，頁63-104；黃仁姿，〈戰時戰後的臺灣農政〉；郭怡榮，〈戰時體制下的警察與臺灣社會(1937-1945)〉。此外，王文昕的〈日治時期台灣媒體中的營養知識——以蛋白質為中心〉，對於戰爭時期的營養學發展，以及蛋白質議題在戰時體制下的變化多所論述；張文義也曾在2004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研討會上以「戰時經濟統制下臺灣人民生活狀況探討(1941-1945)——以豬肉和稻米的配給為例」為題發表，惟該研究似未正式出版。

<sup>9</sup> 無論是臺灣或日本，因戰後百廢待舉，許多戰時的制度仍被持續沿用。以臺灣的米穀為例，即使到了1950年，仍有部分生產、配給統制辦法沿用戰時的體制。參見黃仁姿，〈戰時戰後的臺灣農政〉，頁174-179。

為了使殖民地人民也可以同本國人民一樣為戰爭付出，早在戰爭前夕，日本政府即在臺灣與朝鮮推行皇民化政策，對殖民地人民展開人心動員；戰爭爆發後，各式皇民化運動更是如火如荼推行。皇民化運動的主要目標是改造臺灣人，成為講國語、崇拜神道教、具有日本式姓名，生活起居皆日本化的真正日本人——皇國民，進而使其可以接受國家的人力動員，如同日本人一般參與戰爭。雖然該運動的推行對象包括臺灣與朝鮮等全體殖民地民眾，但真正可以達到日本政府設定的標準而被認可為皇國民者，仍屬少數的殖民地社會菁英。<sup>10</sup>對於廣大的群眾——尤其是作為主要生產力來源的農、工階層來說，要達到「同化政策的澈底」的皇民化目標畢竟不易。為了不使這些廣大的群眾因為無法成為皇國民而自外於戰爭動員，執政當局除了以部落振興會深入地方社會推展各種同化運動外，也不忘時時以「軍官民一體」、「內臺一體」、「內臺一如」、「臺灣一家」為口號，強調臺灣人在帝國中的平等位置，冀以卸除其長期以來因為民族歧視而產生與母國的對立心態，鼓舞其為戰爭協力，響應政府各種動員計畫。<sup>11</sup>即使在最基層的配給機關奉公班舉行常會的時候，「內臺一體」也是主要的宣導議題。<sup>12</sup>

除了人心、人力動員外，物資動員也是總動員體制的重要一環。其中，食物作為生活必需性物資，和武器、彈藥一樣，皆是支撐戰爭的重要材料，也是政府優先採取動員計畫的目標。為了確保前線的戰

<sup>10</sup>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141-257。

<sup>11</sup> 〈一億一體となりて 國體の精華を顯揚 恩赦の大詔渙發に際し——小林總督の諭告〉，《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2 月 12 日，第 3 版；〈新生活の道しるべ 六萬の奉公班一齊にラジオ常會 臺灣一家の誓ひ固し〉，《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8 月 2 日，第 3 版；〈總督諭告(昭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諭告第二號)〉，《部報》，1942 年 3 月 15 日，頁 2-3。

<sup>12</sup> 池田敏雄，〈萬華の常會〉，頁 403-411。

力可以充分發揮，以及後方民眾可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水準，總動員體制形成後，食物或食料品的生產、流通以及消費，即逐步受到政府的管制。事實上，早在戰爭前日本帝國內地就因人口眾多、耕地少，食物供需體系顯得脆弱，政府經常干預糧食市場。尤其自 1918 年國內發生米騷動之後，日本政府逐步建構對於糧食的管制體系，並推行節米運動以及各種代用食，以強化缺糧時的因應能力。1933 年為了因應昭和農業恐慌，更制定〈米穀統制法〉取代原有的米穀法，對於買賣的米穀進行價格限定。中日戰爭爆發初期，原有的糧食供需體系尚稱穩定，但 1939 年朝鮮與西日本發生旱災使得米穀供應短缺，整個帝國的米穀供需體系疲態畢現。為此，日本在 1939 年頒布〈米穀配給統制法〉進行米穀配給統制，臺灣總督府也據此發布〈米穀配給統制規則〉，並自 1940 年第一期米開始，由政府管理其流通與配給。

除了米穀外，各種雜糧、食品等也被視為戰爭物資，紛紛納入統制範圍。先是 1939 年 9 月 18 日頒布實施〈價格停止令〉，各種商品的物價不得以高於該日之價格(通稱「九一八價格」)販賣。1940 年 4 月，也就是米穀配給統制建立的同時，政府依據〈價格等統制令〉，對於蛋、肉品、生鮮魚類和各種食料品等，統一制定販賣價格(又稱「公定價格」)。隨之不久，砂糖成為繼糧食之後，第一個被公布配給統制的食料品。<sup>13</sup> 迨至 1941 年 4 月 1 日隨著〈生活必需物資統制令〉的公布，總督府更陸續發布一系列生活必需品的配給統治規則，如〈肉豚配給統制規則〉、〈臺灣鮮魚介生產配給統制規則〉、〈木炭配給統制規則〉等，使得民眾賴以維生的飲食資源走向全面性的配給統制。總計在臺灣納入配給統制的各種常用的食物或食料品，包括砂糖、小麥粉、澱粉類雜穀、味噌、醬油、食用油脂、豬肉、生鮮魚介、鹽干魚介和

<sup>13</sup> 西東秋男，《日本食品産業の歩み》，頁 263-264。



藻類、罐頭、糕餅(麵包)點心、蔬菜、水果、牛乳和乳製品等。<sup>14</sup>每個大類之下，又有繁複的細項，以生鮮魚介類為例，共分為魚類、貝類、蝦類、蟹類、烏賊類、章魚類，<sup>15</sup>地方政府再據以自行訂定施行細則，如臺北州即將其中的魚類細分成鮪魚、鰻魚、鯉魚、虱目魚等 40 餘種。<sup>16</sup>豬肉的品類雖未像鮮魚介類如此複雜，只有上肉、中肉、下肉等，但在配給時也常被區分為一般配給、產婦病人配給、祭祀節慶配給以及生產者配給等場合，<sup>17</sup>整個配給制度可以說包羅廣大而且周密。自此之後，飲食相關資源的配給統制體系具體成形，民眾日常生活中主要的飲食需求皆在政府的掌控之下。

在「內臺一體化」的要求下，總督府據以發布的各種配給統制法令，除了少數法令因考量現實需求，而在配給的種類和程序與內地有若干差異外，其依據現代營養學的科學理論，設定並維持民眾最低生活標準的基本精神並無二致，也無明顯內、臺人的差別待遇。以米穀的配給統制為例，依據「米穀配給統制規則」，臺灣自 1940 年第一期米開始，米穀生產者對於所生產的米穀，在扣除自家消費和做為種子的保留部分後，由政府以公定價格強制收購，藉以調節島內、外米穀供需。除了米穀外，甘藷、切乾番薯、麥類、大豆、花生、澱粉及麵類也都包括在內。雖然總督府在進行收購、儲存、配給米穀業務的機關與程序，與內地有若干差別，<sup>18</sup>但關切民生最重要的米穀消費基準

<sup>14</sup> 西村信一，《臺灣に於ける物資配給統制機構》，頁 1-67。

<sup>15</sup> 臺北商工會議所編，《臺北商工會議所調查資料(第三十六輯)——臺灣二於ケル物資配給統制機構》，頁 35。

<sup>16</sup> 〈臺灣鮮魚介生産配給等統制規則施行細則〉，《臺北州報》，第 1858 號，1942 年 1 月 1 日，頁 1-4。

<sup>17</sup> 〈地方事情——新竹州豚肉配給實施要領の制定〉，頁 97-102。

<sup>18</sup> 像是由倉庫及土礱間、精米業者所組成的米穀納入組合負責收購，委請精米業者調製成糙米後，由各地食糧局向米穀納入組合購入，配售給當地的

量，也就是每人每天所獲得的配給量，並無族群或內地與殖民地的歧異。

臺灣所實施的消費基準量，是依照日本營養學家推算每人每日所需熱量的八成，換算成每人每日的基本米穀消費量，全國一體遵行。主要內容包括：米穀生產者每人每日配給糙米 3 合 8 勺，普通人 2 合 5 勺。若各地米糧配給不足，則以番薯、麥、乾麵、樹薯等代用食替代。1942 年，政府「基於擴充生產力以及提高國民體位之觀點」的理由，對全國食糧消費基準量進行修正，將原來的容積制改為重量制，且採重點增配主義，提升勞動者、青少年、妊婦的基準量。臺灣的米生產者從糙米 3 合 8 勺改為七分搗米 520 公克，原來的普通成年人從 2 合 5 勺，更改為重量制後，進一步區分為重勞動者 520 公克，輕勞者、青少年、妊婦 390 公克，普通成年人 330 公克。<sup>19</sup>除此之外，政府也嚴格規定餐館、旅社等業務用米僅能使用七分搗米。更明訂每月的 5、10、15、20、25、30 日為節米日，在節米日當天，除了一般家庭三餐中有一餐必須為粥食或代用食外，食堂、喫茶店等餐館皆禁止供應米飯。<sup>20</sup>節米日的規定，不僅使臺灣人在外用餐變得不方便，許多本來就經常流連餐館的日本官吏或商人更受到拘束。從上述法規內容上來看，臺灣人獲配的米穀量不僅比照內地的標準，且因臺灣人中以米穀生產者和勞動者居人口比例多數，勞動量大，獲配數量多，理應處於有利狀況。許多原本是地主的家庭，也紛紛收回若干佃地，改

---

消費米配給組合，最後由配給組成按照政府訂定的消費基準量，配售給米糧生產農家以外的所有民眾。1943 年後整個收購配給系統屢有更張，生產、收購與加工改由農業會負責，配給的部分則由食糧營團處理。收購、配給的範圍，參見李力庸，〈日本帝國殖民地的戰時糧食統制體制〉，頁 63-104。

<sup>19</sup> 林肇編，《臺灣食糧年鑑》，頁 46-48。

<sup>20</sup> 伊藤憐之助，《總動員關係臺灣經濟法令講座》，第 2 輯，頁 87-88。

為自耕，以謀求更多的米糧配給。<sup>21</sup>

反映「內臺一體」精神的米穀配給，其最重要的用意不只是在於強調內、臺人平等、保障臺灣人基本飲食需求，更真實的目的是藉此要求作為農業生產者的臺灣人可以共體時艱，將自己的產物供出給國家使用。臺灣總督府食糧局米穀課長那須重德(1901-?)就表示：

即便臺灣如何豐收，也不允許只在臺灣消費飽食……650 萬島民之人均消費規正量，內外地共通、皆須依照中央的計劃決定。種稻者認為自己種的米吃多少都沒關係、只要自己吃飽就好這樣的想法，消費超過保有量以上的量或隱藏米糧，是擾亂國內戰線的可憎之徒。<sup>22</sup>

然而，即使糧食的配給訂有全國一體的消費標準，也不代表各地方政府在米糧的配給上採取相同的標準。在配給制度一開始實施之時，各地方政府即以呼應節米為理由，採取減配米糧的措施，對於勞動者或是以臺灣人為主之鄉村地區減配的比例尤大，如 1940 年 3 月新竹市將原來 2 合 5 勺的糙米配給更改為 2 合 2 勺，勞動者則改為 3 合。<sup>23</sup>至 4 月初時澎湖、屏東市也分別修訂米糧配給量，前者普通人為 2 合，向來米糧豐產的屏東更只有 1.7 合，<sup>24</sup>1941 年居住在臺中霧峰庄的林

21 因為稻米生產者可以保留較多的米糧，許多原來將耕地給佃農種植的地主家庭，為了增加米糧配給，也紛紛收回若干耕地，將種植的耕地轉移到自家名下。參見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頁 37。

22 那須重德，〈標準食糧と國民生活〉，頁 10-13。

23 〈配給米一人當り二合二勺に引下〉，《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3 月 27 日，第 7 版。

24 〈澎湖民も節米 一日一人二合配給〉，《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4 月 3 日，第 5 版；〈屏東市內飯米配給 一合七勺〉，《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4 月 8 日，第 4 版。

獻堂也在日記中感嘆：「二合五勺之配給米減去二割[按：減去 2 成，只剩 2 合]，因是食糧缺欠甚多，非以蕃薯代用不可」。<sup>25</sup>即使許多臺灣人不滿，但因減配的部分，可以相對應熱量的番薯、薯籤等雜糧補充，在形式上得以維持「內臺一體化」的平等態勢。相對於此，臺灣總督府則是藉著 1942 年糧食消費基準量改正之時，增配重勞與輕勞者的飯米配給，並將輕、重勞的判別權交由州知事或廳長裁決，必要時甚至可支給夜食米。<sup>26</sup>在此融通下，不少地方官吏或機關、會社、學校職員，被認為勞動者，獲得了較多的配給量。<sup>27</sup>多數從事政府機關或學校等工作的在臺日人，也因此可以在配給飯米的數量上獲得了優勢。

相較於以提供國民維生熱量為主的糧食配給，訂有全國一致的通行基準，各種副食品或是燃料在內的飲食生活資源則因內容複雜，生產與配售的形式不一，再加上各地的生活習慣與現實供需狀況各有不同，難以具有統一的標準，地方官員也就更容易以「適正(適當·公平)化」、「圓滑(順暢)」為藉口，進行各種差別配給。

在臺灣，作為生活必需品而採取配給統制的品項，主要是由總督認定，並由總督府發布各種配給統制規則，指定配給統制機構並賦予

<sup>25</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第 13 冊，1941 年 2 月 16 日，頁 76。

<sup>26</sup> 〈重輕勞區分を決定 各種飯米増配要項決定 食糧局發表 / 特別重輕勞の認定〉、〈重輕勞區分を決定 各種飯米増配要項決定 食糧局發表 / 夜食米支給の要項〉，《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2 月 23 日，第 2 版。

<sup>27</sup> 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頁 40。戰爭末期在臺北放送局文藝部工作的呂泉生(1916-2008)也說，當時的公家單位總有管道，取得若干暗盤福利，嘉惠自家的員工，也因此，即使環境再困難，呂泉生總是可以領到一些額外的白米。參見陳郁秀、孫芝君，《呂泉生的音樂人生》，頁 138-139。

收購、流通、配給的專屬權利與責任。<sup>28</sup>但實際的配給執行工作，則是由各州、廳等地方政府詳訂施行要領或細則。因為各地的情況不同，施行要領也有所差異。以豬肉的配給為例，先是由總督府發布〈肉豚配給統制規則〉，明訂臺灣畜產會為主要的豬肉配給統制機關，各州廳內的肉豬收購、流通由各州廳畜產會執行，透過肉豚事務所(集荷所)的家畜市場，將掌握的肉豬，依據轄區各地的人口數，分配予獸肉配給所或零售業者，在當地屠殺後配給消費者。<sup>29</sup>至於生產者生產、販賣豬隻，以及消費者領取配給的細項，則由各州廳訂定〈肉豚配給統制規則施行要領〉，依照各州廳所掌握的豬隻來決定配給額度與配給頻率。但普遍來說，為了獎勵農家努力增產豬隻並如實供出，各地方政府皆在配給要領中訂有獎懲辦法，如新竹州規定，州下生產者若生產豬隻數量符合政府訂定的標準，則可獲得一頭豬中的脂肪全量，並增加八公斤的精肉配給。南投街則規定農家須配合政策依田地規模飼養相應數量豬隻，方可領取配給，若飼養比規定量多 2 頭以上的豬隻，依照出貨的肉給予半頭以內的配給作為獎勵，若飼養豬隻數目未達政府規定的標準，則不予配給。<sup>30</sup>

但實際的配給辦法，往往對於日、臺人家庭有差別待遇，以臺北市為例，1941 年豬肉配給開始實施時即規定以家戶為單位進行配給，全市分成 10 區輪流配給，每個市民家庭每十天配給一次，每戶得以配 50 錢(300 公克)的豬肉，由奉公班收集有意購買之家戶的票券，向各

<sup>28</sup> 松本敬信，〈經濟警察資料〉，頁 114-120。

<sup>29</sup> 〈肉豚配給統制規則〉，1941 年 4 月 18 日，收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4167 號，1941 年 4 月 18 日。除州廳內的配給辦法外，該規則另有州廳間豬肉的配給辦法。

<sup>30</sup> 南投街規定，農家耕作土地面積在 6 分以上、1 甲未滿者需養殖 3 頭，1 甲以上、3 甲未滿者則需養殖 4 頭，依此類推。參見〈豚肉配給實施に伴ふ養豚増殖の一例〉，頁 83-87；〈地方事情〉，頁 97-102。

區之配給所請領。表面上似乎頗為公平，但該年臺北市的日人家庭每戶只有 4.01 人，臺灣人家庭則有 5.21 人，<sup>31</sup>以家戶為單位的配給辦法，每個臺灣人每次可獲配的豬肉尚不足日本人的八成。更重要的是，許多部落被政府指定的養豬頭數與實際的養豬頭數差距太多，不用說得不到特別配給獎勵，就是一般的配給也可能因為供出數目不足而被取消。楊雲萍的〈部落日記〉，儘管是應文學奉公會要求，為了宣揚戰時生活精神而撰寫的小說，但他也適時地反映了當時農民「就是怎樣努力，飼養可能的豬數，還是到達不了指定隻數的」苦況。<sup>32</sup>

不僅地方政府實施的配給要領有日、臺人的差別待遇，最下層的配給機關——區會或町內會，在執行配給時也會自行依照日、臺人而在豬肉品質上有所區別。如高雄市苓雅寮區在執行配給時，來自區會的指示，所有的配給都依照日本人和臺灣人區分成甲、乙兩類。日本人配給是精肉，臺灣人則是取得油脂、內臟、耳、鼻、腳。本來是臺灣人、後來改為日本式姓名的日本碳酸株式會社工場長岡戶榮，因為身為町內會奉公班第六班班長，堅持臺日人以抽籤方式公平分配，但也因此引來班內的日本家庭不滿。值得注意的是，岡戶榮堅持公平配給的理由是其班內臺灣人家庭的主要代表(家長)皆具中學以上學歷、可以使用日語，因此應該與日本人一樣的待遇。<sup>33</sup>換句話說，岡戶榮堅持的不是真正的日臺平等，而是日本人與國語家庭臺灣人的平等，間接反映出當時日本人與國語家庭臺灣人應該獲得較好配給的普遍想法。類似的配給品質不公平現象，不只是苓雅寮區，幾乎全臺普遍發生，當時居住在臺北的柯德三就說，政府的豬肉配給，給臺灣人的是

31 臺北市役所編，《昭和十六年臺北市統計書》，頁 10-11。

32 楊雲萍，〈部落日記〉，收入林瑞明、許雪姬編，《楊雲萍全集——文學之部(一)》，頁 181-378。

33 岡戶榮，〈內臺人の配給法——何れが是か非か〉，頁 46-47。

脂肪，給日本人的是紅肉(精肉)。<sup>34</sup>

除了豬肉外，從許多例子也可以發現，原本講求公平、一體化的配給統制，在地方州廳執行時皆有明顯的差別化現象。如臺北市在1940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砂糖票券購入制，配給規則分成兩種，第一種為分成內地人、歐美人，以及戶稅賦課生產額500元以上的本島人、朝鮮人、高砂族與滿支人等，每人每月可配給0.6公斤的砂糖，第二種為戶稅賦課生產額未達500元的本島人、朝鮮人、高砂族與滿支人則只獲配0.3公斤；同一時間發布的木炭配給，則分成白卡、紅卡兩種票券，白卡的使用者除了內地人外，也包含國語家庭、內地式改姓名、內地式家屋居住者，可獲配20公斤，至於紅卡的使用者為本島人，僅配給5公斤，<sup>35</sup>兩者差別甚大。不僅是食料品與燃料，就是其他的生活用品也出現差別配給情況，如臺北市的棉製品配給，1941年臺北市的棉製品配給，毛巾為內地人1戶2條，本島人3戶2條。手巾方面，內地人1戶1條，臺灣人2戶1條。<sup>36</sup>1943年更改為毛巾、手巾分別為內地人(含國語家庭)1人1條，本島人1人至3人1條，4至6人2條，7至9人3條。<sup>37</sup>雖然各種物資的配給辦法不一，但確實有明顯日本人、臺灣人，或是日本人、國語家庭的臺灣人與臺灣人的差別。

因為配給品品項繁多，各地的配給要領不一，究竟殖民地政府多大程度進行差別待遇，且依據的理由為何，目前所見的資料幾乎無從判定，許多臺灣人對這種差別待遇的說法也眾說紛紜，一般的說法是

<sup>34</sup> 柯德三，《母国は日本、祖国は台湾——或る日本語族台湾人の告白》，頁142-143。

<sup>35</sup> 〈更新の砂糖購入券 廿五日明一ヶ年分を配布〉、〈待望の木炭配給 第一回は今明日中に〉，《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12月21日，第2版。

<sup>36</sup> 〈綿製品配給します タオルは一戸當り二枚〉，《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2月25日，第2版。

<sup>37</sup> 〈タオル、手拭配給〉，《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8月19日，第2版。

分成三種，如當時擔任公學校教師的張建牆(1911-1992)後來回憶，配給共分成三種社會階層：一、日本人得到全額配給。二、換了日本名字的臺灣人得到特別加額的配給。三、多數的人(即臺灣人)食物短缺。<sup>38</sup>但也有人認為只要是改姓名或被認定為國語家庭的臺灣人，就可享有和日人一樣的待遇，<sup>39</sup>和前述岡戶榮的認知一樣。

可以確定的是，幾乎大多數的臺灣人都理解這種差別待遇的存在，且普遍對這種不平等感到不滿。張建牆就認為，「當大多數的人因為缺少糧食而飢餓受苦，必須眼看著新的特權階級，受著特別優待的配給，……我不只是羨慕，還對他們產生反感」。<sup>40</sup>律師陳逸松(1907-1999)也覺得統治者用多配幾兩肉、可以買白糖等差別來鼓勵大家改姓名、說國語並不恰當，他甚至向保安課長表明自己就是因為不願意因「改姓名」、申請「國語家庭」享受特權，而與其同胞有不同待遇，「戰時大家生活都過得很艱苦，應該有難同當，不要再有差別」。<sup>41</sup>因為臺灣人對這種不平等普遍存在不滿，即使許多看似平常的瑣事，像是市場上臺灣人普遍食用的韭菜漲價，而日人常使用的白菜維持原價等，也很容易被認為是執政當局偏袒在臺日人的結果，更加深臺灣人對殖民政府的怨懟。<sup>42</sup>

38 張建牆，《福爾摩沙之夜——一位臺灣八十歲老人的回顧》，頁 365。當時是船員後來成為海運業鉅子張榮發(1927-2016)，也說當時的配給制度是不同的家庭領不同的配給，甲等是日本人，配給最多；乙等指的是臺灣人全家改成日本姓名，會講日語並且過日本生活的「國語家庭」；丙等的配給最少，是指一般的臺灣人家庭。參見張榮發，《張榮發回憶錄》，頁 12-13。

39 謝水森，《竹塹城——日治時期至八十年代憶往》(新竹：國興出版社，2010)，頁 6。

40 張建牆，《福爾摩沙之夜》，頁 365。

41 陳逸松口述，林忠勝撰述，《太陽旗下風滿樓——陳逸松回憶錄》，頁 253-254。

42 池田敏雄，〈戦争と艫舳〉，收入末成道男編，《池田敏雄臺灣民俗著作



殖民者表面上高喊「內臺一體化」，要求臺灣人為戰爭協力，極盡所能增產並供出各種物產，但在配給上卻採取具有族群歧視意味的差別化配給，這對於為戰爭提供食糧等重要戰略物資的殖民地民眾來說，顯然不合情理，配給食物不足加上心中的不滿，無疑將助長黑市的盛行。相對於此，雖然差別化配給確實給了在臺日人更多生活保障，但到了 1943、1944 年時，伴隨著時局日益嚴峻，生產力急遽下降，物資日益枯竭，1945 年更全國性調降米穀消費基準量，即使配給上有了些許優遇，也難以滿足其生活所需，就像在空襲嚴重時期仍留在臺北市的日本人竹中信子所稱，原來應該配給米或者小麥粉的主食品，竟然換成了難以果腹的砂糖與香蕉乾。<sup>43</sup>到了此階段，差別化配給的意義除了徒增民族間的隔閡而外，實際的作用恐怕相當有限。

### 三、黑市——臺灣人的秘密交易網絡

雖然配給統制具有日臺人的差別待遇，但仍有其平等、一體化的意義。因為物品的市售價格、購取數量都被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內，少數原來昂貴的物品，在價格管制作用下也變得平易近人，民眾可以依照配給的數量購買，如 1943 年 5 月 7 日新竹黃旺成的日記中就記載：「今天領配給布四枚十餘元，調若自由買賣，須在四、五十元，木筆[按：黃旺成媳]等談得津津有味。」<sup>44</sup>原來在家庭中地位普遍較為低落的漢人婦女，在餐桌上往往只能享用品質較低或數量較少的食物，但配給統制實施後，因為多數食料品的配給辦法並不特別區分男女性

集(下卷)》，頁 412-418。

<sup>43</sup> 竹中りつ子，《わが青春の台湾》，頁 142。

<sup>44</sup>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以下簡稱臺史所)藏，《黃旺成先生日記》手稿本，1943 年 5 月 7 日，識別號 T0765\_02\_02\_14。

別，她們可以獲配和男人一樣分量的食物或食料品，也可能有助於啟發她們對自身權益的關注，如黃旺成家中原來不喝酒的婦女，卻因家中按人頭獲配米酒，某次竟彼此爭執自己應有的分量。<sup>45</sup>

但物資統制究竟不是正常的交易活動，不僅人們因為消費活動受到限制而感到困擾，生產與配給的統制也造成市場機制扭曲，導致供給過剩或不足等問題，其中物資匱乏更是令民眾在戰爭中倍感痛苦，成為美軍空襲之外另一個對其生存帶來威脅的重大因素。造成匱乏的原因當然與戰爭爆發後前線各種需求增加有關，但後方因為物資統制導致生產力降低、黑市盛行，也是重要的因素。

以前述的豬肉為例，肉豬的生產不只是民生用途，與民眾的蛋白質攝取息息相關，豬皮或豬肉罐頭也是重要的軍事物資，殖民政府很早就意識畜產業在戰爭中的重要性，<sup>46</sup>為了避免市場價格過度波動，1940年夏季即以價格等統制令明訂市場豬肉統一價格。然而，因同時進行米穀配給統制，原來作為養豬飼料的番薯成為米穀減配時的代用食，以至於飼料不足，再加上來自大陸東北的豆粕等飼料進口減少，導致生豬產量降低；另一方面，許多農民也因為豬肉價格統制而惜售豬隻，許多商販也不願長途運輸生豬前往都市，以至於臺北市等依賴外縣市供給肉豬的市場嚴重不足。1940年下半年，居民幾乎不知肉味。

1941年〈豚肉配給統制規則〉實施後，政府獎勵農民飼養並供出肉豬，並透過臺灣畜產會調配各州廳的產量與需求，臺北市的肉荒稍解，<sup>47</sup>但即使如此，每十天才能配給豬肉一次，平均每戶只有300公

<sup>45</sup> 臺史所藏，《黃旺成先生日記》手稿本，1942年4月12日，識別號T0765\_02\_02\_13。

<sup>46</sup> 松野孝一，〈豚も時局下大事な家畜〉，頁55-57。

<sup>47</sup> 〈公平な配給率 豚肉愈よ食膳に上る〉，《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4月21日，第3版。

克。<sup>48</sup>比起 1930 年代臺北市民的豬肉消費每人每日約 35 公克來得少了許多。不獨臺北市，全臺各地也因配給統制而陷入豬肉荒，即使像是林獻堂等富有的地主家庭，也苦於豬肉不易入手而艱於宴客或祭祀。<sup>49</sup>

不只是豬肉，因為經濟統制的範圍逐漸擴大，各種必需品都得依賴配給，但因物資缺乏，配給的分量不足，對於居住在都市、生活需求大多依賴配給的市民來說苦不堪言，其中又以臺北市尤甚，即使是一流的餐館也端不出像樣的菜色。1943 年末搭夜車北上臺北出差的臺南佳里醫生吳新榮就抱怨：「在臺北火車站餐廳吃了早餐，比昨晚在番仔田[臺南隆田]小食堂吃的難吃得多。北部的物資缺乏自在意料之中。」<sup>50</sup>從新竹去臺北的黃旺成也記錄：「來[臺北]公會堂排列買食券 2.5 角，自取自吃，適節米日，用煮熟落花生、香蕉、紅茶代餐」。<sup>51</sup>

事實上黃旺成自己居住的新竹市，境況也好不到哪裡，黃旺成在戰爭時期的日記即深刻反映作為一個城居民眾的苦況。如 1943 年中就有「玉[黃旺成妻]午餐後匆匆出買肉與魚，至晚六時頃才歸」、「玉早晨未食即出待買魚，傍午空手歸，調險些兒吃監督的虧，午後又往等候，晚仍空手回來」、「玉早上出等候買無魚，午後歸又往買些，至晚才歸，還是不吃為上策」；到了 1945 年，不只是魚和肉，連米糧都奇缺，「米欠三日，晝[餐]用樹薯粉，各僅半飽」、「晝，菜食代

48 〈隣組利用の配給 十日に一度豚肉食膳へ〉，《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5 月 25 日，夕刊第 2 版。

49 李力庸，〈殖民、營養與風尚——日治時期臺灣的大眾畜產飲食文化〉，收入王次澄、郭永吉等編，《雅俗相成——傳統文化質性的變易》，頁 415-459。

50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第 7 冊，1943 年 12 月 27 日，頁 243。

51 臺史所藏，《黃旺成先生日記》手稿本，1943 年 4 月 10 日，識別號 T0765\_02\_02\_14。

飯」、「頗思佳味，但談何容易」。<sup>52</sup>民眾使用代用食、在配給所前大排長龍，已成為戰爭時期各都市經常出現的景觀。

因為物資嚴重缺乏，政府只好大力鼓吹食用代用食，像是以番薯籤、樹薯粉代替米糧，以蝸牛、兔肉做為蛋白質的來源，以烘焙後的番仔豆替代咖啡，蕎麥等也被引入臺灣，擬做為稻米的代用品。政府也推廣共同炊煮運動，以減少不必要的食材與燃料損耗，甚至要求民眾完全咀嚼，使食用米飯的營養可以充分消化吸收。相對於政府的「科學性」指導，更多的民眾則是自力救濟，以各種傳統方式對抗匱乏。像是原來居住在城市的民眾利用家中隙地飼養雞鴨，種植花生、番薯等，以作為補充食物的來源；親朋好友間互相周濟、互通有無，以度過缺糧的難關。當時擔任教師的吳濁流(1900-1976)就在其小說《無花果》中提到，當他在遭遇嚴重的缺糧困境時，一個姓范的學生的家長得知消息，特地帶來了一斗米來探望他，「那時的喜悅，就好像在地獄裡遇到佛祖」，<sup>53</sup>類似案例不勝枚舉。許多同樣遭受匱乏之苦的日本人也頗樂意接受來自臺灣人的餽贈，<sup>54</sup>但比起土生土長的臺灣人，移住到臺灣不久的日本人，因為缺少像臺灣人一樣強固、綿密之社會網絡，在這方面顯得單薄而孤立。

除此之外，許多原來已被遺忘的鄉土食或是救荒食物，也再次獲得人們青睞，重新回到餐桌上。醃製醬瓜、豆豉可以佐餐，野生的青

<sup>52</sup> 臺史所藏，《黃旺成先生日記》手稿本，1943年1月24日、1月25日、1月26日；1945年2月4日、4月8日、4月9日，識別號T0765\_02\_02\_14、T0765\_02\_02\_15。該日記缺1944年分。

<sup>53</sup> 吳濁流，《無花果》，頁132-133。

<sup>54</sup> 如1944年9月10日，在物資嚴重缺乏時，吳新榮找了當地的日本人校長和衛生係長到將軍自家魚塢釣斑節蝦，回佳里時，「路過五藤郡守門前，就送他五隻斑節蝦。他很高興，說改天再來做俳句」。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第7冊，1944年9月10日，頁243。

蛙、魚蝦、各種豬、雞內臟品，或是野生的蔬菜，像是黑甜仔(龍葵)、雞肉絲菇、野萵等等都可用來補充副食品的不足。原來臺灣人用來當作豬飼料的茄菜菜，這時候大家也搶著吃。<sup>55</sup>至於臺灣人經常食用的空心菜，因為生長容易，在市場上更是滿坑滿谷，不虞匱乏。雖然鄉村同樣遭受物資管制與配給短缺之苦，但因為有豐富的野生動植物等食料來源，比起城市人家更容易獲得滿足，也更有能力將自己原有的物資供應其他地區的民眾。像是鍾逸人在 1943 年間為了躲避特高警察的糾纏，而逃到嘉義小梅一帶躲藏時，受到好友張為築的招待，宰了一隻肥雞、一碟鹽酥石蝦和醃菜豬肚湯，雖然都是當地的鄉土食，但「在戰時物資極端欠乏的時候，能受到這種豐餐實在也很難得」。<sup>56</sup>也因此，飲食習慣貼近本地風土的臺灣人，比起仍保留內地飲食習慣的日本人來說，更能適應此一艱困的時局。在戰爭中遠赴臺東從事木材生意的彰化商人洪掛(1906-2005)就說：

[戰爭時]民眾為了補充食物，時常在野外尋找野菜回家煮食。

在這個苦難的時期，老天爺似乎很照顧可憐的臺灣人，生長在野外的野菜，例如烏杏仔、黑甜仔菜、豬母乳等，荒地上到處都可以採到，而且生生不息，都沒有病蟲害。<sup>57</sup>

人們不僅利用鄉土食與救荒食物補充戰時生活所需，也藉由這些食物重新認識臺灣傳統生活文化的價值。<sup>58</sup>

但對抗飢餓的更實際、直接做法，則是求助於黑市。雖然當局對於物資的生產與配給統制體系堪稱完整而且周密，經濟警察系統也應

<sup>55</sup> 許雪姬等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頁 75-76。

<sup>56</sup> 參見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頁 211。

<sup>57</sup> 洪掛口述，黃玉峰整理，《看臺灣成長——洪掛回憶錄》，頁 162-163。

<sup>58</sup> 曾品滄，〈鄉土食和山水亭——戰爭期間「臺灣料理」的發展(1937-1945)〉，頁 113-156。

運而生，對於惜賣、買溜(買儲、囤積)，以及黑市交易等活動進行嚴密偵防。<sup>59</sup>然隨著物資供應日益緊促，黑市的利益擴大，也就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像是農人們私藏應該供出的米糧，或省下自己要吃的食物，躲過警察的監視，私下賣給城市中的居民。養豬戶在半夜裡屠宰暗地裡飼養的豬隻，並以較高的價格賣給需肉孔急的飲食店或是城市的消費者。就是設籍列管的豬隻，也可以先將成豬打死，當成病死豬擡到派出所備案、除籍，再扛到隱密的地方支解，將豬肉分送給親友或販賣。<sup>60</sup>即使是政府指定的配給機關或商人也經常上下其手，在針對配給品的全島同步調查中，發現許多業者將木炭及米糧的配給量偷工減料，多出的部分就以高於公訂價的價格賣給料理屋或飲食店。<sup>61</sup>

黑市幾乎無所不在，防不勝防。臺灣的物產豐富，加上城市規模小，四周農漁村環繞，欠缺食料品的市民們很容易前往市郊，向當地的農家購買生活所需的物資，是戰爭時期臺灣黑市發展的有利條件之一，像是當時在大稻埕擔任小學教師的陳勤(1922-2017)女士，因為米糧不足，乃偕同親戚到臺北市郊的土城庄，向農家購買米糧。<sup>62</sup>在新竹

<sup>59</sup> 關於經濟警察的設立，最早是於1938年9月在警務局警務課下，設置經濟保安掛，配置225名經濟警察，分派各州廳開始進行黑市交易的查緝活動，1940年擴大編制，在警務局下正式設立經濟警察課，各州廳也分別設立經濟警察課、經濟警察係。參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治概要》，頁110-111。惟據郭怡棻研究，早在1938年7月「皮革配給統制規則」公布隔日，臺北的南署、北署即派遣警察到轄區商店進行庫藏與價格檢查，開始行使經濟警察職務。至1940年時，經濟警察因擴編，共達385名。參見郭怡棻，〈戰時體制下的警察與臺灣社會(1937-1945)〉，頁23、27。

<sup>60</sup> 陳文榮，《古早味》，頁118。

<sup>61</sup>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昭和篇1926-1945)》，下冊，頁246。

<sup>62</sup> 曾品滄訪問，李虹微紀錄，〈懷念我的大稻埕生活——洪陳勤女士訪談錄〉，頁137-149。

擔任幼稚園教師的劉玉英(1904-2000)，則是拿不用的衣物，和南寮、香山一帶的漁民交換鮮魚。<sup>63</sup>吳新榮就在其日記中驚嘆「住都市的人變成採購部隊，人潮流向鄉下」。<sup>64</sup>更多的是農漁民們自己將糧食、魚肉、蔬菜運入城市裡販賣，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女性自鄉下背著活的小豬乘火車到都市，她用被子蓋著，裝作背嬰兒的模樣，結果被查獲。<sup>65</sup>類似的案子太多，幾乎防不勝防，戰爭時期擔任士林信用組合職員的曹永和(1920-2014)就說，士林農家常將自己生產的農產品運到臺北「偷賣」，從士林到臺北，一定會經過圓山保齡球館前，士林信用組合和中央市場的員工就會在那邊攔截，如有違規偷運的農產品，就用公定價格向他們購買。<sup>66</sup>

但這種攔截法的成效似乎有限，因為更多的物資四面八方而來，無論是大稻埕的圓公園(建成圓環)、永樂市場，或是艋舺龍山寺前的廣場，都有許多攤販販賣水果、蔬菜和各種食物。1942年某日，臺北警察北署對大稻埕太平、永樂市場發動突襲檢查，共查獲25件的蔬菜黑市買賣小販，1萬多斤的蔬菜，可見其活躍狀況。<sup>67</sup>但即使警察署發動取締，仍難以阻絕各種黑市活動，許多小販早已練就躲避經濟警察的功夫。最具代表性的黑市應屬臺北艋舺龍山寺前的廣場，各種露天商販隨意擺攤，白天裡大多是販賣著蔬菜、肉類、魚類、米、五穀雜糧等，到了晚上就有其他攤販販賣現烤的肉，香味四溢刺激著飢腸轆轤之往來人群的味蕾。男人們夜空下喝酒聊天，吵雜喧囂。這些攤販

<sup>63</sup> 李遠輝、李菁萍編著，《北郭園的孔雀——劉玉英的故事》，頁38-39。

<sup>64</sup>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第7冊，1944年11月26日，頁456。

<sup>65</sup> 楊基銓，《心中有主常懷恩——楊基銓回憶錄》，頁152。

<sup>66</sup> 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頁37。

<sup>67</sup> 〈野菜の闇取引 不埒者に鐵槌〉，《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10月22日，夕刊第2版。

一聽說警察前來搜查，立刻訓練有素地一哄而散，龍山寺前的廣場立刻回復到一片平靜的光景。<sup>68</sup>不只是大城市，各街庄也都是一些從事黑市買賣的小商人，<sup>69</sup>黑市已經是全島普遍性的現象。1945年元旦才從日本奉派來臺的中尉岡垣學也驚訝地發現，臺灣生活物資豐富，無論是米、肉、糖、蔬菜、水果、酒類等都可以輕易入手，這種情形在當時的日本內地完全是想像不到的。<sup>70</sup>臺灣黑市物資的豐富，和政府物資配給統制的艱困形成明顯反差。

在1940年剛剛發布〈價格等統制令〉的時候，許多經濟犯罪還只是商店或生產者以高於九一八價格或公訂價格販售商品等不起眼的案件，但隨著配給統制的範圍日趨擴大，各式各樣的黑市交易活動逐漸盛行，經濟犯罪相關案件也迅速增加。以新竹州的統計為例，自從中日事變以來，一般犯罪活動漸次減少，相對於此，經濟犯罪活動則逐次增加，使當局忙不迭應，1941年新竹檢查局全年受理5,020件，比前一年激增1,374件。<sup>71</sup>

殖民政府官員或經濟警察皆認為，黑市活動盛行的原因，不外乎臺灣人缺乏法治觀念與決戰精神、貪圖利益、配給機構不完備，以及經濟犯罪處罰過輕等因素有關。<sup>72</sup>但事實上原因複雜，除了前述的環境因素外，殖民地的社會結構也有助於黑市的盛行，不少相關案件不是個別發生，而是以臺灣人為主體，從生產者、批發商、加工業者，到零售商的系統性、集體化犯罪。這當然與前述因為配給不足、不公

68 佳山良正，《台北帝大生——戦中の日日》，頁117。

69 許雪姬等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頁76。

70 諫山春樹等原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秘話・臺灣軍與大東亞戰爭》，頁85-88。

71 〈新竹州下の違反數〉，《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3月8日，第4版。

72 武政正治，〈闇取引と經濟警察〉，頁4-10；松田光治，〈闇經濟事犯の絶滅〉，《部報》，1941年8月1日，頁19-23。



平而導致臺灣人心不滿有關，但對許多臺灣人來說，從事黑市交易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若以 1944 年的全島統計數據進行分析，該年全臺共發生 34,991 件經濟犯罪案件。在這些案件中，主要分成違反〈國家總動員法〉24,476 件，和違反〈臨時措置令〉9,790 件兩大類，以及少數其他類別案件。違反〈國家總動員法〉的部分，以違反〈價格等統制令〉居絕對多數，高達 22,655 件，占該類型案件 92.5%。違反〈臨時措置令〉案件中，則以違反〈豬肉配給統制規則〉5,334 件和〈皮革配給統制規則〉2,992 件居多數，兩者合計占該類案件的 85%，其次為〈稻收穫高調查規則〉（稻米收成量調查規則）352 件、〈奢侈品等製造販賣制限規則〉305 件、〈米穀配給統制規則〉231 件等等；<sup>73</sup>類似的經濟犯罪趨勢不只是全島的現象，也同樣呈現在 1942 年高雄州的犯罪統計中。<sup>74</sup>表面上看，經濟犯罪的數量驚人，平均每天都有近百件之多。但如果利用現存的日治時期法院檔案，對於這些案件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多數案件都是一個犯罪事實，但因觸犯多個不同的法令，在統計上被當成多個案件加以記錄，實際情況並未如統計數字來的多。更何況這其中還有許多是因為經濟警察過度執法而造成的冤枉事件，就連身兼臺南州織物販賣價格查定委員會委員的吳修齊(1913-2005)，自身都難逃被羅織黑市買賣罪名且被關押的下場。<sup>75</sup>

在違反〈國家總動員法〉的 2 萬多案件中，大多數是被控觸犯了

<sup>73</sup>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治概要》，頁 111-115。

<sup>74</sup> 據 1942 年的報導，高雄地方法院檢查局在該年 2 月受理的 551 案件中，屬於違反經濟關係者居半數以上，達 291 件，其中違反價格等統治令者有 192 件，違反臨時措置令關係者則有 97 件，主要是違反食料、皮革、纖維等臨時措置令。參見〈これで良いか 増加した經濟違反 高雄檢察局最近の數字〉，《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3 月 8 日，第 4 版。

<sup>75</sup> 吳修齊，《八十回憶——臺灣實業鉅子吳修齊》，上冊，頁 121-123。

〈價格等統制令〉，也就是以高於九一八或公訂價格的黑市價格進行交易買賣，亦或是偷斤減兩出售。從法院檔案分析，被告大多是農夫、攤販、糧商、豬肉商、飲食業、養雞業或洋服業者等，他們將生產的稻米、番薯、蔬菜、豬肉、雞、布料、澱粉、纖維或布料等，利用黑市的管道以較高的價格出售。一般而言，該類型的案件多屬小規模違法，往往處以罰金了事，但也不乏商人從事大規模犯罪情況，如住居臺南善化街的林某，即將甘藷和番薯籤澱粉 11 萬餘斤，以高於九一八價格出售，販賣給臺北海山郡高塗等人，金額達 2 萬餘元。<sup>76</sup>

造成這些犯罪現象的原因，乃是政府為了保持低物價，壓低了生產者和銷售者原本應得的利潤，甚至造成他們虧損，但市面上因物資匱乏，有行無市，這些生產者乃偷偷將產品以更高的價格出售。在戰爭時期同樣在善化開設興亞製飴株式會社、從事番薯澱粉製造的孫江淮(1907-2013)就說，政府規定 100 公斤的番薯做成粉為 18 公斤，其中 15 公斤要交給政府，剩下的 3 公斤才能留著自由買賣(按：必須以公訂價格交易)。生意人為了生存，常常不願依公訂價格來處理，偷偷多賣一點。<sup>77</sup>這大概就是上述犯罪案件的真實寫照。對部分商人來說，黑市不只是貪圖利益，更是其求生之道。

因為黑市價格普遍較高，且從原料到成品層層轉賣下，零售價格往往比公定價格高出許多，使得不少人因為買不起黑市物資而挨餓困窘者。來臺就讀臺北帝國大學的佳山良正(1924-2004)就說，在龍山寺前的攤商，一塊肉就得要價 5 元，當時大學教授的月薪也不過 300 至 400 元，即使他的父親每月給他 200 元生活費，但花高額的價錢買肉補充營養，卻對他因為生病而虛弱的身體沒有明顯幫助，反而讓他備感心

<sup>76</sup> 《臺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頁 371。

<sup>77</sup> 林玉茹等訪問，《代書筆、商人風——百歲人瑞孫江淮先生訪問紀錄》，頁 110。

疼且懊惱。<sup>78</sup>許多窮人更是慘澹，1943年共產黨人楊克煌(1908-1978)與謝雪紅(1901-1970)，為了躲避美軍飛機的空襲，結束在臺中市區的三美堂商店生意，搬到臺中頭汴坑的山裡自力更生。但自從遷入山裡後，糧食不夠，黑市米又買不起，遑論魚、肉等副食品，只能吃些自種的樹薯當作代用食，因而營養不良，貧病交迫。<sup>79</sup>但從法院檔案來看，即使像是豬肉等重要的民生物資，黑市價格與公訂價格仍保持一定差距，大抵是一倍以內，<sup>80</sup>這比起日本內地顯然溫和許多。據一位名為芦田均的日本人日記記載，1945上半年，鎌倉當地的黑市白米1升要價25元，1個雞蛋即要價2元。到了7月時，因為食糧配給減少一成的關係，黑市更猛然上漲，據說麥子1斗得要價250元，許多疏開到鄉下的都市人為了米糧，到了賣盡身上的衣物而赤裸的地步。<sup>81</sup>臺灣黑市價格溫和，或與物資相對豐富，且黑市活動盛行、普遍有關。

對消費者來說，購買黑市也有其不得不的苦衷。如前所述，違反〈緊急措置令〉者，主要是以違反〈皮革配給統制規則〉和違反〈豬肉配給統制規則〉居多數。事實上，這兩個統制規則互有密切關聯性，大多與私宰豬隻販賣有關。因豬、牛皮是重要軍需物品，一般配給給豬、牛肉不會附有豬皮或牛皮，故私宰私販者因販賣帶皮的豬肉，

<sup>78</sup> 佳山良正，《台北帝大生》，頁74。

<sup>79</sup> 楊克煌遺稿，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頁203-208。

<sup>80</sup> 配給豬肉分成上、中、下肉三等，價格大抵在1斤(600公克)60至75錢之間，目前法院檔案中保存的豬肉違反價格統制案件，其黑市價格多在1斤70至85錢之間，並未有太大差距。另外一份1942年《臺灣警察時報》刊登的範例是，配給價格1斤95錢，黑市價格則為1元60錢。參見高山喜全，〈中等北京語講座：臺灣語の研究——廣東語の研究〉，頁22-30。雖然這些價格都是1940至1942年的資料，但從相關新聞報導可知，到了1945年時並未有明顯的變動。

<sup>81</sup> 島居民，《昭和二十年》，頁65、228-229。

不僅觸犯〈豬肉配給統制規則〉，也會同時觸犯〈皮革配給統制規則〉。<sup>82</sup>至於單獨違反〈豬肉配給統制規則〉者，則多屬有證照的合法豬肉販，私自剋扣原來應該配給民眾的豬肉，再以高價販售給需要豬肉的飲食店或消費者。

何以豬肉的黑市活動特別盛行？對臺灣人來說，豬肉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食料品之一，具有無法替代的地位。不只是家庭三餐經常需要豬肉與豬油調理，飲食店或是餐館的料理，各種豬肉品更是必要的材料。<sup>83</sup>另一方面，豬肉也是最重要的動物性蛋白質來源之一，無論是源自於傳統的進補觀念，或是受到現代營養知識啟發，豬肉都被認為是有益身體健康的重要食物，尤其在肺結核、夜盲症等盛行的戰爭時期，豬肉或是雞鴨等肉品更被當成確保身體健康的必要食物之一。更重要的是，豬肉品被大量使用在祭祀、宴客及餽贈方面。許多經濟條件不佳或講求生活儉約的家庭，即使平時不常消費豬肉，也得在節慶時設法張羅豬肉祭祀神鬼，如 1943 年 8 月因逢中元節將屆，人們需肉甚急，在配給豬肉嚴重缺乏下，人們只好求助於黑市。這當然很容易引起經濟警察的注目，臺北警察北署特別為此發動搜查，短短三

<sup>82</sup> 如住在臺中的飲食物行商陳立富，因私下向肉豬生產商購買豬隻，再私下屠宰、販賣豬肉和內臟，即以違反家畜市場規則、臺灣屠畜取締規則、肉豚配給統制取締規則、皮革配給統制規則、關於輸出入品等臨時措置法律、國家總動員法、價格等統制令等判決，處以罰金 700 元。參見〈昭和十七年第 799 號(昭和十七年略字第 294 號)〉，收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以下逕稱臺大圖書館)，「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http://t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record.php?searchClass=all&id=sc201010033260](http://t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record.php?searchClass=all&id=sc201010033260)，擷取日期：2017 年 8 月 2 日。

<sup>83</sup> 石坂莊作《臺嶋踏查實記》即統計，在總數約 240 種的支那料理中，約有七、八成皆以豬(豬肉品)作為材料之一。石坂莊作，《臺嶋踏查實記》，頁 153-154。

日間即查獲 85 件私宰豬隻案件。<sup>84</sup>

對臺灣人來說，豬肉品的需求彈性低，不像米糧可使用番薯或樹薯當成代用品，私宰豬隻或私販豬肉的案件自是層出不窮，即使經濟警察極力進行搜查，相關案件仍是有增無已。但其更深層的意義，反映了當時的臺灣人即使經歷皇民化運動，以及政府在物資上的極力控制，都無法改變他們使用豬肉品的消費習慣及其所象徵的傳統飲食與文化意識。準確來說，黑市不僅滿足臺灣人的口慾、維護身體健康，也是他們反抗皇民化、確保自身傳統不可或缺的手段。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現存的日治時期法院檔案中，違反〈總動員法〉的相關案件總共 10,230 筆，其中違反統制令者，共 9,668 筆。<sup>85</sup>在這些可以確認是違反經濟案件中，共有 3,000 餘件登載有被告的本籍。若對此進一步考查可發現，被告姓名為日本式姓名且本籍為日本內地者，僅有 9 案，共 9 人。像是本籍東京的高橋正藏，在臺中從事金庫販賣，因以高於公訂價販售，而違反〈價格等統制令〉；<sup>86</sup>其餘絕大多數案件的被告皆是臺灣人。戰爭時期曾任職臺南州販賣價格查定委員會的吳修齊也曾在其回憶錄中說，當時被查出違反公訂價格而被取締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臺灣人。<sup>87</sup>這不僅因為臺灣人正是這些物資的主要生產者、通路商，以及消費者，更因為不少日本人礙於自己是殖民統治者的身分不便涉入，而參與黑市的臺灣人也因日本

<sup>84</sup> 〈經濟違反〉，《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8 月 18 日，第 3 版。

<sup>85</sup> 目前臺大圖書館所建立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系統所留存的檔案，雖然只是部分地區，像是臺中等地區的相關案件，但因黑市的案件內容太多類似，透過這些案件的內容，仍可反映其普遍的犯罪趨勢。

<sup>86</sup> 〈昭和 16 年第 6843 號(昭和 17 年略字第 104 號)〉，收入臺大圖書館，「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http://tc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record.php?searchClass=all&id=sc201010033054](http://tc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record.php?searchClass=all&id=sc201010033054)，擷取日期：2017 年 8 月 2 日。

<sup>87</sup> 吳修齊，《八十回憶》，上冊，頁 117。

人與執政當局關係密切，盡量避免和其交易。其結果，臺灣的黑市，儼然成了臺灣人專屬的秘密交易網絡。雖屬非法且秘密，但其盛行程度，就連擔任經濟警察的日本人也認為，許多難從配給等合法管道取得的物資，在黑市幾乎都已可到手，單靠取締實在無法遏止黑市的蔓延。<sup>88</sup>

因為黑市成了臺灣人掌握的經濟網絡，是自立於殖民政府之統制經濟之外的一個經濟體系，黑市的盛行就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不僅破壞殖民政府的物資統制與配給政策，使政府掌控的物資日益減少，嚴重影響整個戰爭動員體制的效能，也使臺灣人逐漸脫離配給制度的束縛，進而使得殖民政府藉由差異化配給所維護之日本人——皇民化臺灣人——一般臺灣人的階層化社會結構遭受衝擊。當臺灣人只要有錢都可以從黑市取得生活所需的物資，而日本人卻只能眼巴巴地守著配給制度挨餓時，差別化的配給制度及其所依恃的殖民統治權威，不免受到質疑甚至嘲諷。飽受物資短缺之苦的地理學家富田芳郎(1895-1982)之妻富田奈美就曾抱怨：「配給雖然因內、臺人似乎稍有差別待遇，但是黑市物資的生產者都是臺灣人，他們自己當然比較容易取得。」<sup>89</sup>

在戰況日趨激烈、物資逐漸枯竭下，臺灣人抱怨殖民政府的強迫供出、配給不公，而在臺日人則妒視臺灣人私藏米糧、進行黑市交易，戰線後方的臺灣，儼然上演另一場戰爭——殖民政府與被殖民者的食物資源爭奪戰，經濟警察四出搜查，與生產者或黑市買賣者進行各種攻防。可以說，在殖民地臺灣，戰時體制或是皇民化運動既未造成「內臺一體」，更沒有達到社會再編成的效果，反而增加彼此的矛盾與不滿。

令人意想不到的，就在前線煙硝瀰漫、後方躁動不安的局面之

88 武政正治，〈經濟違反といふもの——殊に闇取引の連鎖性を思ふ〉，頁16-21。

89 轉引自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下冊，頁414。

外，一種自發性的民族融合、內臺一體，卻在偏遠的鄉村悄悄發生。

#### 四、另類同化——疏開與殖民地社會的再塑

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後，隨著殖民政府的建立，數十萬日本人逐漸移居臺灣，臺灣的社會結構也因此分成作為殖民統治者的日本人(內地人)，與被殖民統治者的臺灣人(本島人)兩大部分。雖然共同生活在島上，但兩者之間並未密切融合，即使統治者不斷提出同化政策——試圖透過語言的學習、法律的規範以及風俗的改良，改造臺灣人成為日本人、忠誠的帝國子民，但囿於日本人的民族歧視，並為了確保其作為統治者在殖民地政治上享有的支配性地位，此同化政策乃帶有明顯的階層化意涵。一方面將日本的語言、法律、風俗習慣定位為同化的重要指標，要求臺灣人學習日本文化，形成單向式的同化與融合。但另一方面，為了確保日本人相對於臺灣人的優越性與特殊性，殖民政府不僅在教育、法律等各方面採取差別化的待遇，即使在臺日本人也極力確保其生活習俗的獨特性，藉以區辨日本人與臺灣人。

在此原則下，即使在熱帶的島嶼生活，不僅許多城市裡的日本人住居自成一區，衣著、裝飾仍與內地一同，就是飲食也以內地風氣為尚。<sup>90</sup>即便這樣的生活方式有其種種的不便，像是許多食料品必須遠從內地運來，炎熱環境下食用生食有更多罹病的危險，適合溫帶環境的日本式服裝也不符合熱帶氣候的臺灣，造成經濟、生理上許多不必

<sup>90</sup> 關於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日常生活型態，可參閱王慧瑜，〈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該文從住所交通、餐飲、服飾等面向進行探討，結論指出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大抵呈現三種樣態，一是移植自日本傳統習慣；二是移入明治維新以來風行於日本的西洋化風潮；三是為了適應炎熱氣候，而將日式房子略做修改，喜穿涼爽的洋服，以即飲用冰品等。整體來說，他們仍然盡力保持和內地一樣的生活形式。

要的負擔，許多在臺日人仍不改其志。

到了 1936 年皇民化運動展開時，此同化政策的基調更被進一步強化，不僅要求臺灣人改日本式姓名、常用國語、崇祀神道教，也希望藉由風俗習慣的全面日本化，使殖民地民眾成為真正的日本人，而前述的差別化的配給統制，則成了皇民化的重要輔助手段。即使統治者高喊內臺一體化，但只有經過完整改造的皇國民，才能被視為真正的日本人，有資格享有和日本人一樣的待遇。

在同化運動與皇民化運動的作用下，部分臺灣菁英分子也開始對於自己的生活傳統感到鄙夷，無論如何也要學習日本的生活方式，進而使自己更像日本人。第一代接受日本新式教育並成為國語學校教員、東洋協會專門學校講師的柯秋潔(1872-1945)，即在其遺言中交代自己的喪禮，務必捨棄臺灣傳統的禮儀，改以簡單的形式，並由日本葬儀社舉辦。<sup>91</sup>而其孫子柯德三，回憶其就讀臺北第一中學校時的生活時也指出：

我不知為何從那時[臺北第一中學校四年生]開始，對自己是臺灣人感到自卑，努力假裝自己看起來和日本人一樣。並不是說因為是臺灣人而被欺負，但就是一直警惕著。在家習慣講的臺語，在和朋友講話時會很小心不要講出來。

連中午帶的便當，若帶去媽媽費心準備的滷肉(豚の角煮)和滷蛋等臺灣式菜餚，日本人的小孩們就會說：「你這什麼啊」、「這是豬尾巴嗎？你吃豬尾巴嗎？」我從學校回家後，就哭著和母親說「請幫我做日式的菜」，拼命央求她幫我做像鱈魚子(たらこ)、煎蛋(卵焼き)、鱈魚、味噌沙丁魚乾、海苔壽司、海苔便當這樣日式的菜。當時臺北城內現在的榮町，有一家賣日本醃漬品的店「酒

<sup>91</sup> 柯德三，《母国は日本、祖国は臺灣》，頁 87-88。



卷」，母親特地跑到那個地方幫我準備便當菜。<sup>92</sup>

柯德三開始為自己是臺灣人感到自卑，決定在生活習慣全面日本化的時間點，正是皇民化運動興起的翌年。類似生活方式的轉變歷程，不只是柯德三，也普遍發生在部分臺灣人菁英身上。吳新榮在日記中標榜經常穿著和服，喜歡吃「澤庵」、「味素[噌]汁」、「刺身」、「鋤燒」，以日語交談、思考，又以家中設有榻榻米的座席為榮，因此，「無論是誰都不能否認我們是日本人」。<sup>93</sup>

然而，相對於臺灣總督府大力提倡，且為部分臺灣菁英分子所奉行的皇民化運動，不少在臺灣的日本人知識分子並不以為然，他們不僅肯定臺灣人生活文化的優點與價值，甚至認為同化政策應該是在臺日本人學習臺灣人，而非臺灣人學習日本人。最具代表性的論述如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中川正(1907-1989)在 1939 年所提出的：

臺灣的日常生活中，常被提到內地延長主義。先不談是否有這樣的主義，但在臺灣的生活，尤其是有關內地人的衣食住的的所有事情，進行內地模仿或內地延長乃是事實。

然而，臺灣與內地之間有存在不可否認的自然差異，所以，要直接將臺灣的生活形式改造成與內地生活一致，這是一開始就很勉強地，也因此必須要忍受生活上的不便與不利。舉個用餐的例子來說，我認為以臺灣的材料加進本島原有料理法，再下工夫就有很多好的料理可以品嚐。但[在臺日人]一說到盛饌就是神戶牛、內地產的海膽以及海參腸，食用方法也相對地作成生魚片或清湯，這可以說是非常沒有智慧的。……。

想要具體表現內臺一如的境界，決不是要求臺灣的生活形式和

<sup>92</sup> 柯德三，《母国国は日本、祖国国は臺灣》，頁 108-109。

<sup>93</sup>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第 2 冊，1938 年 1 月 19 日，頁 12-13。

內地的生活相一致。而應是有效利用臺灣的特殊性，建立最適合臺灣風土的生活樣式，安居於異地，甚至到了遺忘內地的境界時，才能稱上真正的內臺如一。<sup>94</sup>

中川正的說法並非沒有學理根據，臺灣人在臺灣已生活數百年之久，就以飲食來說，他們已發展出適應臺灣熱帶環境的飲食習慣與風俗，既經濟又合乎四時節氣。相對於此，一味的內地化，將使臺灣人得大量依賴來自日本的各種食料品，或是栽培、生產不適合本地環境的作物，並不合乎經濟與科學化的原則。

1941 年臺北帝國大學副教授、擔任憲法學講座的中村哲(1912-2003)，也在《臺灣時報》上發表反對盲目改變臺灣風俗習慣成為內地化的意見，他認為改易內地化風俗應該以便利、必要為原則，如果不必要又不便利，即使強制臺灣人更改成為日本自古以來的風俗習慣，也不會有好的效果，「作為文化政策的皇民化，是要普及日本式的國民生活樣式，其生活樣式也至少要比向來本島人的更方便、合理」。<sup>95</sup>進言之，只要臺灣人的風俗既方便又合理，就應該保留。不只是日本人，也有不少臺灣人知識分子，像是吳濁流者對於自己風俗的日本化感到不滿與質疑。<sup>96</sup>

事實上，在戰爭日益激烈、糧食危機日深的同時，除了中川正、中村哲對皇民化提出反對意見外，不少知識分子則更實際地發掘臺灣風俗中的實用價值，並據以推廣，尤其是有關飲食物及其調理技術的優點，有助於克服當時因為物資匱乏而造成的飲食困難，如熱帶醫學研究所的富士貞吉(1891-1977)就大力提倡臺灣人的食物調理技術：「本

94 中川正，〈はがき隨筆——真の內臺一如〉，《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3 月 16 日，第 6 版。

95 中村哲，〈文化政策としての皇民化問題〉，頁 6-12。

96 吳濁流，《無花果》，頁 122-123。

島人在臺灣住了三百年以上，食物的儲藏、調理是因應臺灣風土漸次進步至今的結果。我認為內地人應該利用或應用臺灣人的食品和調理法，來改良內地式的烹調。」<sup>97</sup>甚至連皇奉本部戰時生活部的參事、營養學專家安間節子(1908-?)，也依據科學性的分析指出，臺灣人可以利用的食物種類比起日本人來得多，儲藏方式更高達 80 餘種，對這豐富的本島食進行研究，將可幫助人們在熱帶環境獲得許多營養攝取的相關訊息，無論是當作戰時食品或是非常食糧的預備，都是有必要的。<sup>98</sup>因應日益枯竭的食物供給，以日人成員為主的臺灣植物同好會也蒐集各種野菜知識，包括臺灣各種野菜的種類，以及原住民或漢人的處理、烹調方式，編訂成書，藉以供糧食不足者參考。<sup>99</sup>

然而，真正促使日本人學習臺灣人生活方式，進而在彼此的情感與階層意識上達到「內臺一體」者，則是為了躲避轟炸，而向鄉村或山區移居的「疏開」。自 1943 年起臺灣開始遭受美軍飛機的空襲。除了日益嚴重的糧食不足等問題外，人們又得承受不定時的「爆彈」威脅。尤其對於居住城市的居民而言，面臨轟炸的危險遠甚於居住在鄉村地區。為了確保安全，不只政府鼓勵或強制市民離開市區、疏開到鄉村，許多市民亦自動往郊外避居。這使得日本人與臺灣人之間，以及城市與鄉村之間，打破空間與種族的藩籬，拉近彼此的距離，以至於雙方關係悄悄地發生變化。一段關於新竹州疏散地之日臺人生活的描述，雖可能出自皇民奉公會等戰爭協力機構之手筆，意在宣揚疏開後的日臺一體，但卻也點出當時日本人不得不依附臺灣人，進而與

<sup>97</sup> 富士貞吉，〈食物〉，頁 12。

<sup>98</sup> 安間節子，〈食生活の創意——配給物資を完全に活用せよ〉，頁 20-21。

<sup>99</sup> 臺灣植物同好會在 1945 年出版的《臺灣野生食用植物圖譜》一書中，對於野生植物的利用方式，即發覺並運用臺灣漢人與原住民的相關知識。參見臺灣植物同好會編，《臺灣野生食用植物圖譜》。

臺灣人產生有別於以往之接觸的事實：

一向各別生活的內、臺人現在住在同一個屋簷下，許多人非常親切地迎接款待彼此。……農家以茶水招待，內地人也會贈送他們小孩子的衣服，並幫忙勞動。五十年從未有過這種情況，住在農村的臺灣人與都市的內地人開始新的交流。<sup>100</sup>

在疏開的生活中，疏開者不只賃居農家屋舍，也可以物易物的方式從農家換取食物或食料品，甚至自己採集或捕食各種野味，藉以補充配給品的不足，飲食生活意外地獲得改善。戰爭時期從臺北到大溪避居、開業的醫師陳五福(1918-1997)就認為，由於實施配給制度，加上物資匱乏，若從經濟生活來講，住在大溪總比臺北好很多。因為鄉下地方，農家喜歡養些雞、又有雞蛋，以及蔬菜可吃。<sup>101</sup>吳新榮也認為，「住在鄉間與農民的來往，使人覺得心中有所依靠。在這糧食欠缺的時期無米可食的話，他們就會送些蕃薯來；無魚無肉的話，青菜水果任你取用。」<sup>102</sup>原來擔心鄉村醫療不便的日本人家庭，在疏開後也意外地發現小孩比起在城市居住時更有元氣，而且原來每日三餐缺乏青菜的苦惱也都消失，田間四處都有好吃的野菜。<sup>103</sup>

在戰爭時期，鄉村飲食資源相對豐富，無論是以物易物或是無條件贈與，疏開者都可以直接從農家獲得補給，直接分享農家的剩餘，他們為了回報所得，除了提供衣物、用品外，也與農家一起工作。可以說，離開城市之後，脫離了既有的階層化社會結構，以及戰爭動員體制的鉗制，黑市或配給不足的問題一併在生活中自動消失了，他們

<sup>100</sup> 轉引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下冊，頁399。

<sup>101</sup> 張文義整理記錄，《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頁112。

<sup>102</sup>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第4冊，1940年5月4日，頁219-220。

<sup>103</sup> 西園政江，〈疏開生活〉，頁14-15。

很自然地向農人購取食物，與當地人一樣的飲食、平等地生活，「不必擔心敵機的空襲，糧食也不缺，竟使人容易忘卻了戰爭。」<sup>104</sup>

疏開不只是生活空間的轉移、空襲與缺糧困擾的掙脫，也是疏開者在地化的伊始。他們並不只是單純的進食或享受這些疏開地提供的食物，也常參與各種食料或食物的生產、處理與烹調等勞動過程，並學習相關的技術與知識，甚至藉由食物的餽贈、共享，與當地人建立情誼。像佳山良正(1924-2004)在嘉義民雄的疏開生活中，除了和同學到黑市換取食物外，也學習臺灣人，栽種他們覺得不怎麼好吃但卻很容易生長的空心菜，以花生油爆炒從下水溝撿拾的蝸牛，喝起本地勞動者所喜好的米酒。<sup>105</sup>疏開到屏東鄉下的灣生增田弘夫，不僅在臺灣人節慶時因為幫忙臺灣人鄰居而獲贈肉粽、紅龜等食品，與臺灣人一樣煮絲瓜湯、炒空心菜，甚至和當地人學習捕捉、烤吃田鼠、蜻蜓、蒼蠅蛆，其一派臺灣鄉野生活經驗，幾乎與臺灣農村小孩無異。<sup>106</sup>帶領家族輾轉疏開到嘉義番路的屏東高女教頭濱谷甚一郎(1904-?)也回憶，在疏開地有繁茂的熱帶果樹，可以隨手摘取香蕉、鳳梨等食用，而豬肉配給日當天，他們也可獲得當天才在村中屠宰的豬肉，使成長中的孩子不至於缺乏蛋白質，最重要的是，孩子們也因此養成了使用以豬肉料理為主之臺灣料理的喜好。<sup>107</sup>至於帶領臺北師範學校女子部學生疏散到今南投草屯之雙冬的鹽澤亮(1904-1976)，也在 1946 年描繪的圖畫中記載：

<sup>104</sup> 鹽澤亮著，張良澤譯，《從臺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一位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教學教授在戰爭末期的紀錄》，頁 38。

<sup>105</sup> 佳山良正，《台北帝大生》，頁 116-118。

<sup>106</sup> 增田弘夫，《台灣の戰中戰後の物語：灣生——台灣生まれの日本人》，頁 24-25、52-53、72、85-86。

<sup>107</sup> 濱谷甚一郎，《台灣島に別れを告げて——北回歸線直下の亜熱帯に生きて》，頁 164-167。

[學校周圍的]農場裡種番薯、山芋。菜園裡種有茼蒿、蔥、茄子、高麗菜、白菜、玉米等，每有收成，就分給學生，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圖中的農人名叫陳阿乾，是雙冬本地人，忠厚的農民，戰爭結束後，他說：「請老師在這裡當農夫，我把土地分給您。」<sup>108</sup>

在地化的生活與飲食經驗，不只使得日本人平安度過戰爭時期難捱的匱乏，更迫使他們放棄其統治者的優越感、一味地內地化，轉而加速融入臺灣人的社會中，與本地人和善相處。

不論這些疏開者的在地化是出於自願或無奈，對於經常把食物當成建構、鞏固人際關係之介質，以餽贈和分享食物當成是人際關係維繫手段的臺灣人而言，日本人願意接受臺灣人食物與幫助，甚至與臺灣人一樣勞動，也意味著從原來高高在上的殖民統治者降貴紆尊，轉化成為可親近的、甚至是值得同情的一群人，被臺灣人接納與包容，就像物理學者鄭天佐所描述之戰爭末期借住其家的日本軍官家庭，「他們一樣挨餓，也和我們一樣瘦弱」。<sup>109</sup>當時作為一個中學生的柯旗化(1929-2002)也觀察到，「當地人對遠來的內地人伸出溫暖的手，內地人到此已捨棄其優越感，過著不自在的疏散生活，並學習跟本地人互助合作」。<sup>110</sup>即使是遠在山區的部落，也不乏類似的情景。戰爭時疏開到花蓮山區擔任國民學校校長的山口政治(1924-2010)，在數十年後回憶那段山區生活時寫到：「在這樣的山區的艱苦生活，產生出日本人與高砂族(原住民族)互相幫助的強烈羈絆的人際關係，經過數十年的現在，仍然如同親戚般持續有交流。」<sup>111</sup>

<sup>108</sup> 鹽澤亮著，張良澤譯，《從臺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頁24。

<sup>109</sup> 鄭天佐，《在真空中成長》，頁35。

<sup>110</sup> 柯旗化，《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頁23。

<sup>111</sup> 山口政治，《知られざる東台湾——湾生が綴るもう一つの台湾史》，頁364。

在疏開的情境下，政府配給的重要性已降低，殖民政府試圖利用差異化配給來鼓動皇民化的力量也逐漸弱化，既有的階層化意識也隨之鬆動。不僅是日本人與臺灣人關係逐漸產生變化，原來自認為是菁英的知識分子，也因為處處依賴農人而開始對於自己的能力與貢獻產生反省，「事實證明……在戰爭來臨的時候，只有那些在鄉村從事農作的臺灣人能夠好好地照顧自己的生活」。<sup>112</sup>

相對於城市裡經濟警察令人恐懼且厭惡地四處搜捕黑市活動，且日、臺人又因為配給的差別待遇而彼此嫌隙，在疏開的鄉村地區，以共同生活、食物分享為基礎，原有的階層意識逐漸瓦解，皇民化的同化政策被逆轉成在地化，反而逐漸醞釀一番五十年來從未有的殖民地景象。即使不久之後戰爭即告結束，日本人被遣送回日本內地，這段短暫而特殊的殖民地生活經驗仍迴盪在許多日、臺人的記憶裡，就像曾經疏開到臺中雙冬的鹽澤裏，數十年後懷念當年在雙冬的生活：「那麼不可思議而有魅力的世界。」<sup>113</sup>

## 五、結論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主要參戰國為了支應戰場上大量耗損的人力與物力，紛紛在戰線後方施行各種動員計畫，不論性別、族群或階層，皆被要求為戰爭出力，終而使戰爭的局面迅速擴展，演變成人類史上少見的總體戰。然而，這些動員計畫因為講求參戰一體化，對於國民的權利與責任採取強制的均質化政策，原本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因此面臨衝擊，不僅為當時的社會重整創造契機，更為戰後各國的政治

<sup>112</sup> 張建牆，《福爾摩沙之夜》，頁 362。

<sup>113</sup> 鹽澤裏，〈回憶臺灣，思念雙冬〉，收入鹽澤亮著，張良澤譯，《從臺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附錄，頁 111-113。

與社會運動埋下伏筆。

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當然無法自外於日本帝國所實施之總動員體制，不僅在人力與物資上承受各種動員命令，甚至早在中日戰爭尚未展開之時，即先行實施人心動員——皇民化運動，使臺灣原有的殖民地社會結構迎來重整的契機。關於戰爭動員對於臺灣社會的衝擊，目前已有豐碩的成果，多數論述總動員體制的構造與效能，以及在此動員體制下，臺灣人被支配的過程與影響。有別於此，本文以動員計畫中的食物配給統制，以及伴隨而來的黑市活動為核心，分析臺灣人對總動員體制的能動性，及其對殖民地社會造成的影響。本文研究發現，殖民政府雖然表面上聲稱內臺一體，但在進行配給制度時，仍以日本人、皇民化的臺灣人、一般臺灣人進行差別化配給，並未真正地落實均質化政策。面對此不公平待遇，即使臺灣人必須被迫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的動員命令，但作為食物或食料品的主要生產者、供給者，卻得以發揮潛在的反制能力，以集體化、普遍化的黑市活動消解總動員體制的束縛、滿足自身的食物需求，甚至進一步鬆動食物配給統制政策，並對其在講求戰爭一體化下仍執意鞏固的不平等社會結構造成威脅。配給的不公平與黑市的盛行，使得作為後方的臺灣儼然上演另一場日、臺人之間，或是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食物戰爭，尤其在食物資源日益枯竭的情境下，更加深了彼此的嫌隙與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在戰爭末期為了躲避空襲與缺糧而向鄉村展開的疏開活動，反而為殖民地社會的重塑帶來了短暫的契機。作為殖民統治者的日本人疏開到鄉村後，不僅脫離了專屬殖民者的生活空間與氛圍，也打破了原有的階層化社會，轉而尋求在地化，從當地人處分享食物，一起平等生活，形塑新的殖民地社會。隨著戰爭終了，這短暫的疏開經驗旋即結束，無法當成日臺人關係改善、殖民地社會重整的指標，但它確實反映了在戰爭動員體制中，臺灣人並非只是單純的被



動員、被支配的對象，其憑藉的在地化優勢及其對食物資源的掌握，確具有扭轉皇民化運動與改造不平等社會結構的實質影響力。

(本文於 2017 年 9 月 4 日收稿；2017 年 12 月 20 日通過刊登)

\*本文初稿〈餐桌上的戰爭——日治末期臺灣的食物配給、黑市與殖民社會〉，原發表於 2015 年 9 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韓國高麗大學、國民大學共同主辦，在高麗大學舉辦之「韓國與臺灣殖民地經濟比較研究研討會」，發表時受與會者諸多指正，謹此致謝。此外，本稿撰寫期間，黃仁姿博士、王文昕小姐、張郁沛小姐、郭怡榮小姐、曾郁芳小姐皆曾提供相關研究資料或協助蒐集史料，文稿審查時，兩位匿名審查人也提供許多寶貴的建議，在此特申謝忱。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地方事情——新竹州豚肉配給實施要領の制定〉，《臺灣畜產會會報》，5：7(臺北，1942)，頁 97-102。
- 〈豚肉配給實施に伴ふ養豚増殖の一例〉，《臺灣畜產會會報》，5：8(臺北，1942)，頁 83-87。
- 安間節子，〈食生活の創意——配給物資を完全に活用せよ〉，《臺新》，1：7(出版地不詳，出版年不詳)，頁 20-21。
- 《部報》(臺北)
- 《臺北州報》(臺北)。
- 《臺南州管内概況及事務概要》，臺北：臺南州役所，1941。
-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
- 《臺灣總督府府報》(臺北)。
- 中村哲，〈文化政策としての皇民化問題〉，《臺灣時報》，23：1(臺北，1941)，頁 6-12。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黃旺成先生日記》手稿本，檔號 T0765-02-02-13、T0765-02-02-14、T0765-02-02-15。
- 石坂莊作，《臺嶋踏查實記》，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899。
- 伊藤憐之助，《總動員關係臺灣經濟法令講座》，第 2 輯，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40。
- 西村信一，《臺灣に於ける物資配給統制機構》，臺北：臺北商工會議所，1943。
- 西園政江，〈疏開生活〉，《臺灣公論》，1945：1(臺北，1945)，頁 14-15。
-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2008。
- 那須重德，〈標準食糧と國民生活〉，收入臺灣食糧經濟新聞社編，《臺灣戰時食糧問題》，臺北：臺灣經濟出版社，1943，頁 10-13。
- 岡戶榮，〈內臺人の配給法——何れが是か非か〉，《新建設》，2：2(臺北，1943)，頁 46-47。

- 松本敬信，〈經濟警察資料〉，《臺灣警察時報》，189(臺北，1941)，頁 114-120。
- 松野孝一，〈豚も時局下大事な家畜〉，收入臺灣食糧經濟新聞社編，《臺灣戰時食糧問題》，臺北市：臺灣經濟出版社，1943，頁 55-57。
- 林肇編，《臺灣食糧年鑑》，臺北：臺灣食糧問題研究所，1945。
-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第 13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2007。
- 武政正治，〈經濟違反といふもの——殊に闇取引の連鎖性を思ふ〉，《臺灣警察時報》，317(臺北，1942)，頁 16-21。
- 武政正治，〈闇取引と經濟警察〉，《臺灣警察時報》，299(臺北，1940)，頁 4-10。
- 高山喜全，〈中等北京語講座：臺灣語の研究——広東語の研究〉，《臺灣警察時報》314(臺北，1942)，頁 22-30。
- 鳥居民，《昭和二十年》，東京：草思社，1912。
- 富士貞吉，〈食物〉，《科學の臺灣》，10：6(臺北，1943)，頁 12。
- 綠柳生，〈時局新用語解説〉，《臺灣刑務月報》，6：3(臺北，1930)，頁 32。
- 臺北市役所編，《昭和十六年臺北市統計書》，臺北：臺北市役所，1943。
- 臺北商工會議所編，《臺北商工會議所調查資料(第三十六輯)——臺灣ニ於ケル物資配給統制機構》，臺北：臺北商工會議所，1943。
- 臺灣植物同好會編，《臺灣野生食用植物圖譜》，臺北：臺灣農業會，1945。
-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治概要》，東京：原書房株式會社，1973，據 1945 年原刊影印出版。

## 二、近人論著

- 山口政治，《知られざる東台湾——湾生が綴るもう一つの台湾史》，東京：展転社，2007。
- 王文昕，〈日治時期台灣媒體中的營養知識——以蛋白質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 王慧瑜，〈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石津朋之，〈総力戦と社会の変化〉，收入三宅正樹等編，《総力戦の時代》，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3，頁 59-95。

- 池田敏雄，〈戦争と艋舨〉，收入末成道男編，《池田敏雄台湾民俗著作集》，下卷，東京：綠蔭書房，2003，頁 412-418。
- 池田敏雄，〈萬華の常会〉，收入末成道男編，《池田敏雄台湾民俗著作集》，下卷，東京：綠蔭書房，2003，頁 403-411。
- 竹中りつ子，《わが青春の台湾》，東京：図書出版社，1983。
-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昭和篇 1926-1945)》，下冊，臺北：時報文化，2009。
- 西東秋男編，《日本食品産業の歩み》，東京，山川出版社，2011。
- 吳修齊，《八十回憶——臺灣實業鉅子吳修齊》，上冊，新北：龍文出版社，2001。
-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草根出版社，1995。
- 李力庸，〈日本帝國殖民地的戰時糧食統制體制——臺灣與朝鮮的比較研究(1937-1945)〉，《臺灣史研究》，16：2(臺北，2009)，頁 63-104。
- 李力庸，〈殖民、營養與風尚——日治時期臺灣的大眾畜產飲食文化〉，收入王次澄、郭永吉主編，《雅俗相成——傳統文化質性的變易》，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0，頁 415-459。
- 李力庸，〈戰爭與糧食——太平洋戰爭前後臺灣的米穀統制(1939-1945)〉，《兩岸發展史研究》，2(桃園，2006)，頁 103-137。
- 李遠輝、李菁萍編著，《北郭園的孔雀——劉玉英的故事》，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9。
- 佳山良正，《台北帝大生——戦中の日々》，東京：築地書館，1995。
- 林玉茹等訪問，《代書筆、商人風——百歲人瑞孫江淮先生訪問紀錄》，臺北：遠流，2008。
-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 柯旗化，《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高雄：第一出版社，2002。
- 柯德三，《母国は日本、祖国は台湾——或る日本語族台湾人の告白》，東京：桜の花出版，2005。
- 洪掛口述，黃玉峰整理，《看臺灣成長——洪掛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1996。
- 張文義整理記錄，《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臺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1996年。
- 張建牆，《福爾摩沙之夜——一位臺灣八十歲老人的回顧》，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8。

張榮發，《張榮發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7。

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郭怡榮，〈戰時體制下的警察與臺灣社會(1937-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陳文榮，《古早味》，臺北：二魚文化出版社，2012。

陳郁秀、孫芝君，《呂泉生的音樂人生》，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

陳逸松口述，林忠勝撰述，《太陽旗下風滿樓——陳逸松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

陳翠蓮，〈戰爭、世代與認同——以林獻堂、吳新榮與葉盛吉為例〉，收入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臺北：遠流出版社，2008，頁223-279。

曾品滄，〈鄉土食和山水亭——戰爭期間「臺灣料理」的發展(1937-1945)〉，《中國飲食文化》，9：1(臺北，2013)，頁113-156。

曾品滄訪問，李虹微紀錄，〈懷念我的大稻埕生活——洪陳勤女士訪談錄〉，《國史研究通訊》，5(臺北，2013)，頁137-149。

黃仁姿，〈戰時戰後的臺灣農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16。

楊基銓，《心中有主常懷恩——楊基銓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

楊雲萍，〈部落日記〉，收入林瑞明、許雪姬編，《楊雲萍全集》，第1冊，文學之部(一)，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頁181-378。

增田弘夫，《台灣的戰中戰後的物語：灣生——台灣生まれの日本人》，佐倉：增田弘夫，2008。

鄭天佐，《在真空中成長》，臺北：秀威，2004年。

諫山春樹等原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秘話・臺灣軍與大東亞戰爭》，臺北：文英堂，2002。

濱谷甚一郎，《台灣島に別れを告げて——北回歸線直下の亜熱帯に生きて》，金沢：出版者不詳，1995。

謝水森，《竹塹城——日治時期至八十年代憶往》，新竹：國興出版社，2010。

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

-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臺北：自由時代，1988。
- 藍適齊，〈可悲傷性，「戰爭之框」與臺籍戰犯〉，收入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頁 393-433。
- 鹽澤亮著，張良澤譯，《從臺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一位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教學教授在戰爭末期的紀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
- Lynch, Edouard. "Food Stocks, the Black Market, and Town and Country Tensions in France during Two World Wars and Beyond." In *War, Agriculture, and Food: Rural Europe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edited by Paul Brassley, Yves Segers, and Leen Van Molle, 229-244.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Zweiniger-Bargielowska, Ina. "Fair Shares? The Limits of Food Policy in Britai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Food and War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edited by Ina Zweiniger-Bargielowska, Rachel Duffett, and Alain Drouard, 125-138. Farnham, Surrey, England: Ashgate, 2011.

### 三、網路資源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http://tc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index.htm](http://tc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index.htm)，擷取日期：2017 年 8 月 2 日。

## **Food Wars: Rationing, Black Markets, and the Colonial Society of Taiwa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Pin-tsang Tseng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examines both the changing status and the agency of Taiwanese people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ways local people resiste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Wartime Mobilization Scheme. The three aspects of this analysis are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food rationing scheme implemented at the end of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subsequent black market activities arising from popular resistance to it, and the mutual aid and exchange of provisions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during the evacuation period.

Most existing studies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and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conceive the Taiwanese as targets of mobilization and the Kominka movement. This article, however, argues that as the producer of foodstuffs, they were capable of constituting a force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differentiated rationing scheme through extensive black market activities during the time of war-induced food shortages. In addition, such activities proved destructive to the hierarchal social structure tha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hough seeking "wartime-integration," managed to maintain in Taiwan. The lack of rationing resources at the end of war, as well as the evacuation-dispersion (*shukai* 疏開) practice to avoid airstrikes, forced the Japanese both to appreciate Taiwan's traditional dietary habits and to seek localization of their daily life. An unprecedented "Japanese-Taiwanese integration," a phenomenon that had never been seen in previous decades, was thus observed in the colonial society at this point. More importantly, the Taiwanese were not merely the targets of mobi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rtime Mobilization Scheme.

Rather, the local advantage they possessed and their control over food resources equipped them with substantial influence that could both turn the tide of the Kominka movement and change the unequal social structure.

**Keywords:** Wartime Mobilization Scheme, food rationing scheme, black market, Kominka movement, localization